

# 论司马迁《史记》创作与《春秋》学之关系\*

边家珍

**提要:**学界对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之关系虽有所探讨,但从《春秋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影响的,尚不多见。司马迁效法孔子作《春秋》,在《史记》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。《春秋》笔法是《春秋》的精髓所在,对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影响甚大;后人对《史记》的“破例”颇多微辞,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《春秋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。司马迁在思想上受《春秋》公羊家的影响,但在《史记》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。

**关键词:** 司马迁 史记 《春秋》学

作者边家珍,男,1965年生,文学博士,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(济南250100)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自言要“考信于六艺”<sup>①</sup>，“六艺”即六经。六经之中,司马迁又特别重视《春秋》。学界对《史记》创作与《春秋》学的关系虽有探讨,但从《春秋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影响的,尚不多见。兹尝试论之,以就正于方家。

## 一、孔子作《春秋》对司马迁著史动机的影响

从现存文献来看,孟子第一次明确地说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,其后经过儒家后学特别是《春秋》公羊学派的阐发,完整的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理论最终形成。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?孟子讲: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,天子之事也;是故孔子曰: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’”<sup>②</sup>孟子认为,《春秋》实非孔子偶然所为,而是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现实的巨大而深沉的忧患、抱着一定的政治用意而作《春秋》的,这用意不是别的,就是要正名,就是要恢复西周盛世之礼制,以达于“王道”之理想,所以说“春秋,天子之事也”。孟子又说:

\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汉代散文与经学之关系研究”(13BZW043)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“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”(12RXYB21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61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2121页。本文引《史记》均见此书。

② 杨伯峻译注:《孟子译注》,中华书局,1960年,第155页。

“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杻杻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<sup>①</sup>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的“作”字的含义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是在“鲁之《春秋》”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造，不是说原先什么也没有，孔子无中生有地硬造出一部《春秋》来。就内容来说，孔子作的《春秋》所讲依然是齐桓、晋文之类的霸业，其文体也与“鲁之《春秋》”旧文一样，是一部史书。不同之处就在于孔子作《春秋》时把“义”即政治思想加进去了。按照儒家后学的说法，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寄寓了许多微言大义，由于害怕受到当时诸侯贵族的迫害，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没有明确写出来，而是由孔子口头授给弟子，再由弟子口口相传，最后在汉代才著于竹帛，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春秋谷梁传》就是以阐释《春秋》微言大义为名义而出现的。这就使得“鲁之《春秋》”与孔子所作之《春秋》有了本质的区别：一个还是与“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杻杻》”无甚区别的一般史书，一个是借助历史材料来讲政治的经典式巨著，孟子的见解无疑是敏锐而准确的。至《公羊传》，便将未经孔子加工的鲁《春秋》叫做“不修《春秋》”，以表明经过孔子修过的《春秋》与“不修《春秋》”有本质的不同<sup>②</sup>。关于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的意义，孟子说：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<sup>③</sup>在孟子看来，孔子作《春秋》为社会树立了合乎西周礼制的王道理想，使“乱臣贼子”无所逃于诛责，完全可以与大禹治洪水、周公“兼夷狄驱猛兽”相提并论。《公羊传》继承并发展了孟子关于《春秋》讲天子之事的观点，说：“君子曷为为《春秋》？拨乱世，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……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以俟后圣。”<sup>④</sup>这话显然从孟子那里脱胎而来的。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年）发生了获麟事件，孔子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他的受命符瑞，董仲舒说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先正王而系万事，见素王之义焉。”<sup>⑤</sup>董氏所言乃《春秋》公羊家说，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云：“汉兴至于五世之间，唯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，其传公羊氏也。”<sup>⑥</sup>

司马迁上承孟子与董仲舒的看法，对孔子作《春秋》评价甚高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“桀、纣失其道而汤、武作，周失其道而《春秋》作”<sup>⑦</sup>，把孔子作《春秋》与汤、武伐桀、纣以及陈涉起义相提并论。他还阐发董仲舒之言，突出强调了《春秋》的划时代的意义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……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”<sup>⑧</sup>董仲舒以为孔子处于乱世，不满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，政治理想不能实现，便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述，表明自己的是非观念，以达到其贬天子<sup>⑨</sup>、退诸侯、讨大夫以达

① 杨伯峻译注：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92页。

② 《公羊传》庄公七年：“……曷为谓之如雨？《不修春秋》曰：‘雨星不及地尺而复。’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霰如雨。’何以书，记异也。”（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影印，1980年，第2228页b）此“君子”，当指孔子。何休《公羊解诂》说：“不修《春秋》，谓史记也。”说明“雨星不及地尺而复”，乃是旧史的原文，是孔子修订为“星霰如雨”的。

③ 杨伯峻译注：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155页。

④ 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影印，1980年，第2354页ab。

⑤ 《汉书》卷56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509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121，第3128页。

⑦ 《史记》卷130，第3310页。

⑧ 《史记》卷130，第3297—3298页。

⑨ 按封建社会的常理而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矛头主要应对着下头的“乱臣贼子”，而对于周天子这个“王”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要“尊”的。这里，司马迁引董仲舒之言竟说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”。过去读《史记》的人们读到这里，发现这“贬天子”不是孔子的思想，于是便怀疑这里的文字有问题，如清末李笠说“三字衍。孔子作《春秋》所以扶君抑臣，明上下之分，‘贬天子’非其义矣”。而班固在写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时，则早已将这三个字删掉了。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，这当是司马迁的一种手法，是把他的理想加在了孔子头上——如果孔子以“贬天子”作为写《春秋》的目的之一，那么司马迁《史记》讥刺天子也是“合法”的了。（参见韩兆琦主编：《史记通论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35页。）

于王道的目的。

可以看出,司马迁完全接受了董仲舒对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认识,而且他对《春秋》历史意义的阐发,对《春秋》政治作用的称颂,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另外,《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说,孔子作《春秋》后,“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,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其真,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,成《左氏春秋》”<sup>①</sup>。《匈奴列传》赞曰:“孔氏著《春秋》,隐桓之间则章,至定哀之际则微,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,忌讳之辞也。”<sup>②</sup>在司马迁看来,《春秋》是褒贬并用、赏罚分明的。在《儒林列传》中,司马迁还说“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,曰‘苟有用我者,期月而已矣’。西狩获麟,曰‘吾道穷矣’。故因史记作《春秋》,以当王法,以辞微而指博,后世学者多录焉”<sup>③</sup>,完全是《春秋》公羊学家的口吻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记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说: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,典天官事。后世中衰,绝于予乎?汝复为太史,则续吾祖矣。……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……幽厉之后,王道缺,礼乐衰,孔子修旧起废,论《诗》《书》,作《春秋》,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,而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。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载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,汝其念哉!”<sup>④</sup>司马谈的遗命实际上是希望司马迁效法孔子,写出像《春秋》那样的史书。司马迁十分理解其父的遗愿,说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,正《易》传,继《春秋》,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际?’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。”<sup>⑤</sup>司马迁明确表示要以孔子为榜样,继承他作《春秋》的精神,为汉家树立一个辨别是非、善恶、贤与不肖的标准。另外,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说“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”,又说自己“厄困鄙、薛、彭城”<sup>⑥</sup>,显然有意识地以孔子自况,或者说用孔子的事迹来鞭策激励自己。《孔子世家》中,司马迁更不无深情地写道:“子曰:‘弗乎弗乎,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,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?’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……约其文辞而指博。”<sup>⑦</sup>要之,效法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著述宗旨,使司马迁站在当时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与思想高度,俯察两千多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、学术文化及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与人物,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,阐明自己的看法,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成“一家之言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,《史记》是第二部《春秋》。近人梁启超说司马迁“著书最大目的,乃在发表司马氏‘一家之言’,与荀卿著《荀子》、董生著《春秋繁露》,性质正同”<sup>⑧</sup>,这话固然不错,不过笔者以为首先应当说司马迁著书与孔子作《春秋》“性质正同”,方为知本之论;实际上孔子作《春秋》也是在发表他不尽同于春秋其他思想家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
## 二、《史记》与“《春秋》笔法”

司马迁在《孔子世家》中记孔子作《春秋》,“笔则笔,削则削,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弟子受《春秋》,孔子曰:‘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,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’”<sup>⑨</sup>后世遂将孔子行“笔削”、立褒贬、寄寓

① 《史记》卷14,第509—510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110,第2919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121,第3115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130,第3295页。

⑤ 《史记》卷130,第3296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130,第3300、3293页。

⑦ 《史记》卷47,1943页。

⑧ 梁启超: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·史记》,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之七十二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18页。

⑨ 《史记》卷47,第1944页。

微言大义称之为“春秋笔法”。春秋笔法是《春秋》的精髓所在,对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影响甚大。

《春秋》常在称谓上体现褒贬,如《春秋》庄公六年:“春,王正月,王人子突救卫。”<sup>①</sup>王人指周天子下面的一个小官,官虽卑微,但其所负的“救卫”的责任重大,所以孔子郑重地书其表字“子突”以示褒扬。又,僖公二十三年记:“十有一月,杞子卒。”<sup>②</sup>其实,杞原是侯爵之国。《春秋》庄公二十七年有“杞伯来朝”之语,为何这里又称“子”了呢?《左传》曰:“书曰‘子’。杞,夷也。”<sup>③</sup>“杞,夷也”,指杞伯舍华夏之礼而行夷礼,这是孔子贬抑他的根据。《孔子世家》中说:“吴楚之君自称王,而《春秋》贬之曰‘子’;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,而《春秋》讳之曰‘天王狩于河阳’;推此类以绳当世。”<sup>④</sup>

司马迁继承发展了《春秋》在称谓上体现褒贬的笔法,还体现在他所创造的《史记》“五体”上。所谓“五体”,指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、书,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是前三体。天子称本纪,诸侯曰世家,列传是叙列人臣事迹。可见,司马迁所创造的这些体裁,是按封建等级定其高低,然后再按照历史人物的封建等级进行归类的。然而,司马迁在进行历史人物归类时,有时又不严格按照封建等级进行划分,这就是“破例”。这些破例大都是有褒贬的,比如,项羽自称楚霸王,并未建号天子,司马迁为了褒扬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,将他列入本纪。为了表彰孔子对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,把他列入世家。清代赵翼说:“孔子无公侯之位,而《史记》独列于世家,尊孔子也。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,亦皆书‘是岁孔子相鲁’,‘孔子卒’,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。”<sup>⑤</sup>汉初开国功臣萧何、曹参、张良、陈平、周勃诸人,当然算不上诸侯,但司马迁为了褒扬他们的开国功勋,也把他们列入世家。反之,汉初“真正”的诸侯吴王刘濞、衡山王刘赐等人,因叛逆王室,都被贬入列传。至于把反抗社会的游侠和深受社会压抑的商贾叙入列传,当然有褒美之意;而《酷吏列传》、《佞幸列传》等篇,从篇名即可看出作者的贬斥之意。后人不察,对司马迁的这些“破例”颇多微辞,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“《春秋》笔法”的继承与发扬。

于叙事中寄寓褒贬是《春秋》的又一笔法。如《春秋》庄公二十三年记:“秋,丹桓宫楹。”《公羊传》谓:“何以书?讥。何讥尔?丹桓宫楹,非礼也。”<sup>⑥</sup>《春秋》只通过看似平常的记述加以展现,实际上已注入了贬斥的态度。《史记》对《春秋》这种写作方法予以继承与发扬光大,褒的方面,如《郑世家》写“郑相子产卒,郑人皆哭泣,悲之如亡亲戚。子产者,郑成公少子也。为人仁爱人,事君忠厚。孔子尝过郑,与子产如兄弟云。及闻子产死,孔子为泣曰:‘古之遗爱也!’”<sup>⑦</sup>《李将军列传》写李广“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”而引刀自刭后,“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百姓闻之,知与不知,无老壮皆为垂涕”<sup>⑧</sup>。如此,作者对传主的态度与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。贬的方面,如《高祖本纪》写刘邦为皇帝后,五日一朝太公。太公家令以人主拜人臣,皇帝“威重不行”来点醒太公,以至于出现了父亲向回家的儿子“拥篲,迎门却行”的场景,司马迁写刘邦“心善家令言,赐金五百斤”<sup>⑨</sup>。这看似平常的叙述,堪称婉而多讽、刺讥入骨。试想,刘邦方陶醉于“吾遇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”<sup>⑩</sup>的意得志满之境地,但对乃父却苦于不得不例行朝拜,不情愿又不便明言。这时,太公家令先意承旨主动劝导太公成功,当然就要重赏了。《平准书》写武帝为表彰卜式“输家之半县官助边”、“有余辄助县官之用”及愿为朝廷而死的表现,“赐爵关内

①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1764页b。

②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1814页c。

③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1815页a。

④ 《史记》卷47,第1943页。

⑤ 赵翼著,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:《陔余丛考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0年,第72页。

⑥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2237页b。

⑦ 《史记》卷42,第1775页。

⑧ 《史记》卷109,第2876页。

⑨ 《史记》卷8,第382页。

⑩ 《史记》卷99,第2723页。

侯,金六十斤,田十顷”,然而“布告天下,天下莫应”<sup>①</sup>。这“天下莫应”四字,说明天下人皆知正是武帝穷兵黩武、穷奢极欲,导致使国库虚竭,天下疲弊,故无人响应。又如《酷吏列传》写宁成等人因用法严酷而受到武帝的重用与提拔。赵禹、张汤、义纵、尹齐诸人传记中,都提及“上以为能”;王温舒“好杀伐行威不爱人”,杀人“至流血十余里”,“天子闻之,以为能”<sup>②</sup>,真可谓无声之讽。

司马迁通过运用《春秋》笔法,达到了“善善恶恶”的写作目的。班固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评论《史记》说:“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才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<sup>③</sup>需要指出的是,《史记》运用了《春秋》笔法,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孔子的某种局限。《春秋》是一部政治教科书,它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,倾向性十分鲜明;然而孔子又主张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,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”<sup>④</sup>,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。刘知几《史通·疑古》篇有言:“鲁史之有《春秋》也,外为贤者,内为本国,事靡洪纤,动皆隐讳。”<sup>⑤</sup>《春秋》的褒贬,事实既非一般人所能知,又常不一概而论,而是因人情之易惑者特加显示。为了避讳,《春秋》记事详远而略近。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则有所不同,他不为王者讳,不为尊者讳,记事略远而详近,秦汉史部分在《史记》中所占篇幅相当大。更重要的是,《史记》写人有本有末,所言所行多通过写实的方法表出,美丑善恶显而易见,这是对《春秋》的大超越。

### 三、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公羊学

《春秋》学的发展过程,由孔子所修订的《春秋》开始,到汉初由公羊寿、胡毋子都著于竹帛的《公羊传》,再到董仲舒的《春秋》公羊学。周予同先生指出:“《公羊传》是‘《春秋》学’里第一部重要经典……是《春秋》的第一次扩大。”<sup>⑥</sup>《公羊传》着眼于政治,重在阐发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,它为此后的公羊学家进一步阐发《春秋》奠定了某种思想基础。董仲舒熟习儒家经典,但他于学术上的立足点还是《春秋》公羊学,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“丞相公孙弘本为《公羊》学,比辑其议,卒用董生”<sup>⑦</sup>。《春秋》公羊学家们讲微言大义,讲天人感应,旨在为维护王权服务。通观《史记》,我们注意到,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”,强调的是历史规律,强调的是人事活动,而不是天意。他说“国之将兴,必有祲祥,君子用而小人退。国之将亡,贤人隐,乱臣贵”<sup>⑧</sup>,突显的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天命迷信。然而,作为大儒董仲舒的学生,司马迁又认同董仲舒的“三统”说<sup>⑨</sup>。《历书》中说:“夏正以正月,殷正以十二月,周正以十一月。盖三王之正若循环,穷则反本。天下有道,则不失纪序;无道,则正朔不行于诸侯。”<sup>⑩</sup>《高祖本纪》太史公曰:“夏之政忠。忠之敝,小人以野,故殷人承之以敬。敬之敝,小人以鬼,故周人承之以文。文之敝,小人以僇,故救僇莫若以忠。三王之道若循环,终而复始。周秦之间,可谓文敝矣。秦政不改,反酷刑法,岂不缪(谬)乎?故汉兴,承敝易变,使人不倦,得天统矣。”<sup>⑪</sup>意思是说,秦之所以败亡是因为秦王朝逸出了三统及其三统所要求的施政方略,汉王朝顺应了三统循环的要求,可以说是得天道而兴。因

① 《史记》卷30,第1431、1432、1439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122,第3148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62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2738页。

④ 杨伯峻译注:《孟子译注》,中华书局,1960年,139页。

⑤ 赵吕甫校注:《史通新校注》,重庆出版社,1990年,第774页。

⑥ 朱维铮编: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年,第500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88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617页。

⑧ 《史记》卷50,第1990页。

⑨ 董仲舒认为夏王朝是黑统,商王朝是白统,周王朝是赤统,历史依三统顺序循环,是谓三统循环论,可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⑩ 《史记》卷26,第1258页。

⑪ 《史记》卷8,第393—394页。

此,司马迁在《历书》中提出“王者易姓受命,必慎始初,改正朔,易服色,推本天元,顺承厥意”<sup>①</sup>,并积极参加武帝时的改制活动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受《春秋》公羊学的影响,司马迁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天人感应、君权神授观念,如《高祖本纪》写刘邦是蛟龙感生的,说“刘媪尝息大泽之陂,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,太公往视,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,遂产高祖”<sup>②</sup>。《高祖本纪》中又说“高祖为人,隆准而龙颜,美须髯,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”;又记“秦始皇帝尝曰‘东南有天子气’,于是因东游以厌之”<sup>③</sup>。凡此,都意在表明刘邦成就功业是所谓天授,非人力也。《天官书》中又说:“汉之兴,五星聚于东井。平城之围,月晕参、毕七重。诸吕作乱,日蚀,昼晦。吴楚七国叛逆,彗星数丈,天狗过梁野;及兵起,遂伏尸流血其下。……由是观之,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。”<sup>④</sup>这些句子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非常相似,如董仲舒说:“凡灾异之本,尽生于国家之失。国家之失乃始萌芽,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;谴告之而不知变,乃见怪异以惊骇之;惊骇之尚不知畏恐,其殃咎乃至。”<sup>⑤</sup>司马迁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的某种矛盾,我们似乎可以从其师董仲舒《春秋》学神道设教以维护王权的理论中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。

《史记》还继承了《春秋》公羊学的“大一统”观念。《春秋》“隐公元年,春,王正月”,所谓“王正月”就是周王朝所采用的历法的正月,即周正。对此,《公羊传》作了细致的解释:“元年者何?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?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?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?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?大一统也。”<sup>⑥</sup>文中的“大”字,这里作为动词,是推重、张大的意思;一统,指天下万民皆统系于周天子。徐彦疏:“王者受命,制正月以统天下,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以为始,故言大一统也。”<sup>⑦</sup>从某种意义上讲,《春秋》公羊家讲“大一统”,就是要一统于皇帝,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。董仲舒说:“《春秋》立义……有天子在,诸侯不得专地,不得专封,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,不得舞天子之乐,不得致天子之赋,不得适天子之贵。君亲无将,将而诛。大夫不得世,大夫不得废置君命。”<sup>⑧</sup>司马迁颇受《春秋》公羊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,他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录贾谊《过秦论》之言,称颂秦统一天下之功:“秦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,天下之士斐然乡(向)风,若是者何也?曰: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,王霸既殁,令不行于天下,是以诸侯力政,强侵弱,众暴寡,兵革不休,士民罢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,是上有天子也。”<sup>⑨</sup>战国时代兵革不休,广大百姓都渴望天下统一安定,司马迁称颂秦的大一统,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。

在夷夏关系问题上,孔子曾说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”<sup>⑩</sup>,当是从保存周代传下来的道德礼义的意义上来讲的,意思是说如果诸夏不注意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,尊夷狄为君,就有道德礼义沦丧的危险。至《公羊传》,一方面强调“严夷夏之大防”,一方面又认为“夷”与“夏”可以互变。《公羊传》对夷狄仰慕、遵守礼义者则“中国之”。如《春秋》宣公十二年记“晋荀林父帅师,及楚子战于郟,晋师败绩”,《公羊传》阐释说:“大夫不敌君,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?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。”<sup>⑪</sup>董仲舒发挥公羊家说曰:“《春秋》之常辞也,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,至郟之战,偏然反之,何也?曰:《春

① 《史记》卷26,第1256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8,第341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8,第342、348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27,第1248—1249页。

⑤ 苏舆撰,钟哲点校:《春秋繁露义证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259页。

⑥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2196页abc。

⑦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2196页c。

⑧ 苏舆撰,钟哲点校:《春秋繁露义证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112—114页。

⑨ 《史记》卷6,第283页。

⑩ 杨伯峻译注:《论语译注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4页。

⑪ 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影印,1980年,第2284页c。

秋》无通辞,从变而移。今晋变而为夷狄,楚变而为君子,故移其辞以从其事。”<sup>①</sup>《春秋》公羊学对夷狄仰慕、遵守礼义者则“中国之”的认识,为汉王朝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受其影响,为了论证融夷入夏的合理性,司马迁从血缘上加以追溯,以为众多的少数民族与华夏实际上是出于同源的。清李景星说:“太史公记史,始于五帝,重种族也。盖五帝始于黄帝,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,后世或居中国,或居夷狄。”<sup>②</sup>如谓“匈奴,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,曰淳维”<sup>③</sup>;“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,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,姓驺氏”<sup>④</sup>;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高阳。高阳者,黄帝之孙,昌意之子也”<sup>⑤</sup>;“秦之先,帝颡顼之苗裔孙曰女脩”<sup>⑥</sup>等。也就是说,从族源上看他们都是正统的华夏后裔,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,由于地域环境不同而接受了不同的文化,脱离了原来的华夏文化圈,才被视为“夷狄”的。

## 结 语

司马迁效法孔子作《春秋》,在《史记》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。《春秋》笔法是《春秋》的精髓所在,对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影响甚大;《史记》体例上的“破例”,正是司马迁对《春秋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。司马迁在思想上受《春秋》公羊家的影响,但在《史记》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。正如清人章学诚所称赞的:“史迁绝学,《春秋》之后,一人而已。其范围千古、牢笼百家者,惟创例发凡,卓见绝识,有以追古作者之原,自具《春秋》家学耳。”<sup>⑦</sup>《史记》在唐代之后获得了巨大声誉,说明司马迁效法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目的是达到了的。

责任编辑:项义华

① 苏舆撰,钟哲点校:《春秋繁露义证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第46页。

② 李景星:《史记评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91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110,第2879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114,第2979页。

⑤ 《史记》卷40,第1689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5,第173页。

⑦ 章学诚著,叶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4年,第464页。